

第 19 辑

文物研究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考古学会 编



科学出版社

文物研究

第 19 辑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考古学会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发表了32篇文章,其中调查、发掘资料17篇,特别是集中刊发了一批明清时期的材料,以期让读者对长期遭到忽视的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有详细的了解。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专业工作者和有关人员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研究.第19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03-035483-9

I. ①文… II. ①安… ②安… III. ①文物—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7657号

责任编辑:王光明 柴丽丽/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赵德静/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年9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插页:12

字数:470 000

定价:1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1. 黄山田干明清墓地出土陶仓（M11：3）



2. 合肥出土北宋刻花端石印盒

《文物研究》

主 办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考古学会

编辑部门 《文物研究》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 朔 知

编 辑 罗 虎 陈 超

编 务 郑 玲

编辑部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469号

编辑部邮箱 wwyjah@163.com

邮 政 编 码 230061

目 录

考古研究

- 史前“八角星纹”原型探析 徐 峰 (1)
- 初论史前彩绘石刀的发展 刘文强 (11)
- 蚌埠双墩一号墓的文化“潜信息” 金 锐 周 群 钱仁发 (22)
- 潜山彰法山、彭家岭战国至西汉墓群概述 李丁生 (30)
- 汉画像“鸟啄鱼”图像述论 刘立光 (33)

考古发现

- 安徽淮南市山南地区先秦遗址调查简报 淮南市博物馆 (45)
- 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丰县文物管理所 (62)
- 安徽临泉县沈子国古城遗址调查报告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泉县博物馆 (94)
- 安徽宿州市邱园战国至汉代墓群发掘简报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宿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101)
- 安徽淮南市唐山战国至汉代墓葬发掘报告 淮南市博物馆 (112)
- 安徽天长市槽坊汉墓群发掘简报 天长市博物馆 天长市文物管理所 (126)
- 安徽宁国市“八路一桥”建设工程中墓葬及窑址清理简报 宁国市文物管理所 (132)
- 安徽马鞍山市秀山新区宋墓发掘简报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局 (146)
- 安徽广德县南塘村宋—清代墓葬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49)
- 河南新郑市铁岭元代水井发掘简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55)
- 河南郑州市卫生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明墓发掘简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63)
- 安徽蚌埠市仇岗明墓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蚌埠市文物管理处 (174)
- 安徽蚌埠市方沟明清吴氏家族墓发掘简报 蚌埠市文物管理处 (177)
- 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田干明清墓地发掘报告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85)
- 安徽寿县新城区八座清墓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寿县文物局 (223)
- 安徽铜陵龙干、鸡笼山、破塘宋代和明清墓地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37)
- 安徽马鞍山市小山明清墓地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52)

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

- 光谱技术在史前陶器研究中的应用述评 郎爱萍 (262)
- 从三槐村王氏宗祠看岳西古祠堂的四个基本特征 陈 铎 (270)

文物研究

蒙城县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	蔡凌凯 (275)
合肥绩溪路出土北宋刻花端石印盒浅识	夏 腾 (280)
安徽含山褒禅寺大塔地宫出土文物	石建城 (282)
枞阳文物管理所藏寿州窑黄釉印花枕	吴得华 (286)
明汤和与汤和墓	钱仁发 (288)
淮北出土《前乡贡进士扬州府儒学训导蛰庵任公墓志铭》考释	解华顶 (292)
池州摩崖石刻“金公避兵处”的发现与考析	张邦启 (300)
天长市博物馆馆藏明清铜镜	天长市博物馆 (305)

学术动态

书讯	(310)
课题	(311)
校勘	(312)
《文物研究》启事	(313)

考古研究

史前“八角星纹”原型探析

徐 峰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摘要] 八角星纹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盛行于东海岸的核心区域，即太湖地区和海岱地区的一种纹饰。它是体现早期宇宙观“四方—中心”的符号模型。目前有关八角星纹的解读，如“九宫”说、“巫”说，表面上看似矛盾，实则内涵一致，作为文化基质性的部分，它们均与龟有关。

[关键词] 八角星纹 原型 龟

八角星纹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纹饰，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盛行于东海岸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即太湖地区和海岱地区^①。所谓“八角星纹”，就是中间有一个正方形或圆形，周边展现出八个三角形，因而称作“八角星纹”。八角星纹的形状与我们习惯上接受的那种八角指向八个方向的图形不同，它虽有八角，却不正指八方，而是每两角平行指向一方，因而八角实际标示的只是东、南、西、北四方^②。

从已经积累的考古资料来看，这种纹饰最早见于马家浜文化。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江苏武进潘家塘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在属于马家浜类型的陶器中，有一件扁平鼓形纺轮，上、下两面均有刻纹，上面刻八角星纹，底面刻双线山座形纹，线条规整，未见明显使用痕迹（图一，1）^③。

在太湖地区，承接马家浜文化的是崧泽文化。这一时期，八角星纹数量显著增多。在浙江嘉兴大坟遗址中，出土了一件人形葫芦瓶，瓶底圈足上有8个“十”字形缺口。这八个缺口并非将圈足八等分，而是长短有致，应是有意为之，而把这八个缺口连接起来后，

① 陈声波：《八角星纹与东海岸文化传统》，《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年第6期。

②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3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③ 武进县文化馆、常州市博物馆：《江苏武进潘家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5期。

就是一个规整的八角星纹(图一, 2)^①。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掘中, 属于崧泽文化的崧泽中层出土的两件陶器上压划有八角星纹, 一件为盆形豆(T2: 7), 圈足上刻划一圈规整的八角星纹(图一, 3)^②; 另一件为陶壶(M33: 4), 壶底压划一个中间带菱形的八角星纹(图一, 4)^③。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 八角星纹依然常见。《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中有一件马桥遗址良渚文化层中出土的阔把杯(M204: 3), 阔把外侧中部刻划一纹饰, 线条虽不甚工整, 但属八角星纹无疑(图一, 5)^④。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鱼篓形黑陶罐上(74WCHJ127: 1), 腹部阴刻有八角星纹(图一, 6)^⑤。这个符号, 似乎可视为八角星纹的一种简体, 而这种形式的八角星纹与崧泽文化那件葫芦瓶圈足缺口连接起来的纹饰非常相似。另在一江之隔的海安青墩属于良渚文化的陶纺轮(M17: 3)上亦有类似图案(图一, 7)^⑥。

太湖之外, 海岱地区也发现有八角星纹。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邳县大墩子遗址M44中出土了一件彩陶盆(M44: 4), 环绕陶盆腹部一周有七个八角星图案(图一, 8)^⑦。

在同属大汶口文化的邹县野店遗址中出土一件彩陶盆(M35: 2), 其腹部绘满彩色图案, 在上、下部的深褐色宽带上绘白色斜栅纹, 其间有四个等距的白彩勾深褐彩勾边的方心八角星纹, 每两个八角星之间又以白彩椭圆圈相接, 其内又置四个白彩圆圈, 从而构成繁缛画面(图一, 9)^⑧。泰安大汶口遗址也出土有八角星纹彩陶豆(M2005: 49)与彩陶盆(M1018: 32)(图一, 13、14)^⑨。

八角星纹除了盛行于东海岸地带海岱和太湖两大文化区之外, 在其他文化区也有零星发现。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南台地小河沿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彩陶器座(F4: 3)上有八角星纹(图一, 10)^⑩。湖南安乡汤家岗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泥质白陶盘底(M1: 1)印有八角星纹(图一, 11)^⑪。何介钧认为长江中游地区八角星纹的源头似可上溯至岳阳坟阳堡遗址皂市下层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八角形镂孔垫座^⑫。与湖南相邻的江西, 属于新石器

① 陆耀华:《浙江嘉兴大坟遗址的清理》,《文物》1991年第7期。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5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7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彩版三·3,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⑤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九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⑦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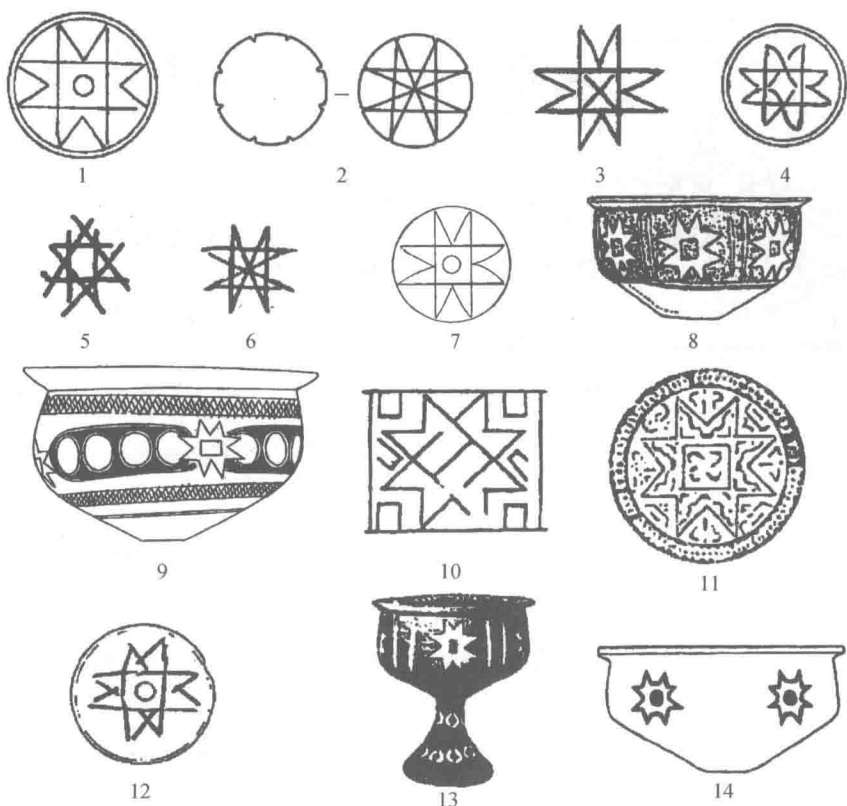
⑧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第6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⑨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第167页,彩版一·1,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⑩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⑪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

⑫ 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考古》1996年第2期。



图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八角星纹

1. 马家浜文化（武进潘家塘） 2~4. 崧泽文化（嘉兴大坟、上海青浦、上海青浦） 5~7. 良渚文化（上海马桥、吴县澄湖、海安青墩） 8、9、13、14. 大汶口文化（邳县大墩子、邹县野店、泰安大汶口、泰安大汶口）
10. 小河沿文化（敖汉旗小河沿） 11. 大溪文化（湖南安乡汤家岗） 12. 樊城堆文化（江西靖安）

时代晚期的靖安樊城堆文化墓葬中发现的一件陶纺轮上也刻有八角星纹（图一，1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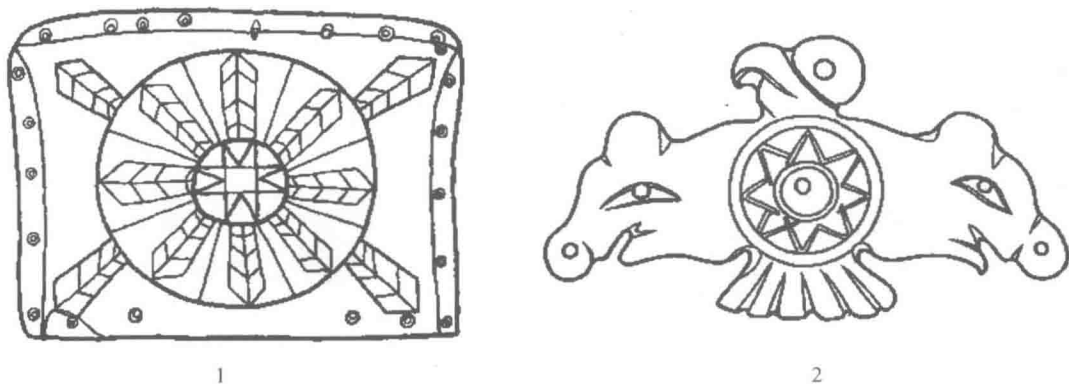
上述八角星纹多以陶质器物为载体。从有关资料来看，八角星纹还被刻于玉器、铜器等物上。其中颇负盛名的一例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87M4 中出土的一件玉版，刻有圆形图案，其中心也是八角星纹（图二，1）^②。凌家滩文化距今约 5600~5300 年^③，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98M29 中还出土一件玉鹰，鹰作展翅飞翔状，头和嘴琢磨而成，眼睛用一对钻的圆孔表示，两翅各雕一猪头似飞翔状，腹部规整刻划一直径 1.8 厘米的圆圈纹，内刻八角星纹，八角星内又刻一直径 0.8 厘米的圆，圆内偏左上又对钻一圆孔（图二，2）^④。

① 李家、刘林、刘诗中：《樊城堆文化初论——谈江西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2 期。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 47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 278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④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 249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图二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上的八角星纹

1. 玉版 (87M4:30) 2. 玉鹰 (98M29:6)

凌家滩地处江淮之间，恰好是海岱文化区向太湖文化区过渡的地带。凌家滩文化中八角星纹的发现反映了东方沿海地带的文化连通性，也证实了东海岸人群对于八角星纹共同的认知。凌家滩的八角星纹还有些特殊之处，比如以玉为载体，且非单独出现，而是与其他造型、纹饰相组合，从而增加了八角星纹背景的深度。尤其像 87M4 中的玉版，它出土时夹在一只玉龟的腹甲和背甲之间，像这样的考古学背景对于解读八角星纹的内涵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于以往的背景，凌家滩文化的八角星纹颇有些身价倍增的意味，引来了学界诸多的关注和探讨。

八角星纹自史前时期即已出现，之后在青铜时代和历史时期仍有流传。今日在很多民间艺术图案中，仍然可以看到八角星纹的身影。不过，当今的八角星纹可以说“形式”大于“意义”，制作者只是对传统艺术图案一种惯性的继承^①。

对于史前时期的八角星纹，由于这是它们最初出现的时段，且在众多考古学文化中被发现，特别是像凌家滩玉版、玉鹰那般重要的礼仪性器物上也存在，我们便没有理由“怠慢”八角星纹，而应透过这一特殊的纹饰去探寻它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有关八角星纹的解释堪称众说纷纭。陈久金、张敬国两位学者认为凌家滩玉版中心的八角星纹是太阳的象征^②。李修松亦从此说^③。张明华、王惠菊认为含山玉版和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八角星纹为“四鱼相聚形”，是一个以鱼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联盟的族徽^④。李学勤认为八角星纹是“巫”字，古代的“巫”字呈十字形，是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而“工”即古代的“矩”，则“巫”就是操着“矩”测量

① 笔者 2011 年在云南旅游期间，在少数民族的服饰、帽子、琴等物上均见到八角星纹，我曾上前询问当地人对八角星纹有何看法，他们并不知情。

② 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 年第 4 期。

③ 李修松：《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玉版的文化内涵》，《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6 期。

④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 年第 10 期。

天地者，故远古时代的巫，通晓天文术数，以沟通人神天地，以“巫”为中心的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一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①。王育成认为含山玉版、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八角星纹的产生与龟甲囊用绳索捆绑的组合方式有关^②。王籽认为八角星纹是史前织机的部件^③。冯时认为八角星纹为九宫图形，即原始的洛书^④。陆思贤、李迪在解读八角星纹的文化精蕴时认为，从图案的总体形象看，四方八角呈花蒂形，开花结果是农业获得丰收的基础，故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喜爱画各种花卉图案，最终精练出了八角星纹图案，深刻反映了农业生产与观象授时的密切关系^⑤。

有关八角星纹的探讨可能还有，但当今文章发表、发行的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了一件难事，对已有研究虽尽力搜求，亦恐有阙漏。在此，笔者仅举上述诸例，它们也是目前学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关于八角星纹比较富有代表性的解读。以下，对上述观点作简略评述。

八角星纹“太阳说”，已有学者表示过异议。王育成指出，所谓方心八角形为太阳的象征并无充分证据，在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习见的太阳纹图案为一实心圆外套双环（或单环）及光芒纹^⑥。

与“太阳说”类似，“四鱼相聚”说、“花卉”说都仅仅是从外形上进行比较而得出的一种猜测式结论。若查看这些观点的论证过程，可知篇幅甚小，皆是在论证众多图案时涉及了八角星纹而作的一笔带过式探讨，论证上尚欠周密。

八角星纹“织机部件”说是将八角星纹与历史上的织机部件进行对比而发现两者类似，论证充分，可备一说。但仍有疑问，并非所有织机部件都为八角星纹，八角星纹也并非全部是织机部件。或许织机部件确实采用了八角星纹这一形式，然而，八角星纹的文化内涵及原型还有深层次挖掘的余地。

众所周知，史前艺术符号的文化阐释是有难度的，论者经常会陷入“盲人摸象、各见其摸”的尴尬境地，不知谁是谁非。要破除这种尴尬，笔者以为，透过那些表面看起来矛盾的观点，去发现隐藏的内在关联不失为接近真相的一个有效途径。

如此，笔者建议特别关注王育成、李学勤、冯时三位学者的观点。通过比较三者的观点，我们试图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发掘八角星纹的原型。王育成是以含山玉龟和玉版作为切入口来讨论八角星纹的，他首先注意到了玉版夹于玉龟之间，进而引出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等地的“龟灵”习俗。同时，他注意到新石器时代东方沿海地区的龟甲大多经过整治，有的有穿孔和绳绑的痕迹。他指出，有“×”的方心八角形图案是绑缚

① 李学勤：《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中国文化》199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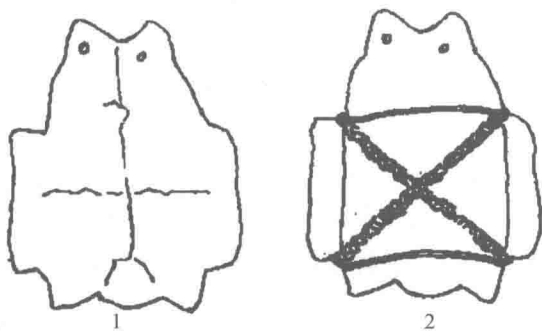
② 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1992年第4期。

③ 王籽：《八角星纹与史前织机》，《中国文化》1990年第1期。

④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373、3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⑤ 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第13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⑥ 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1992年第4期。



图三 龟腹甲及其捆扎示意图
(据《文物》1992年第4期)

便没有“×”图案这一点，龟腹甲与八角星纹仍有可比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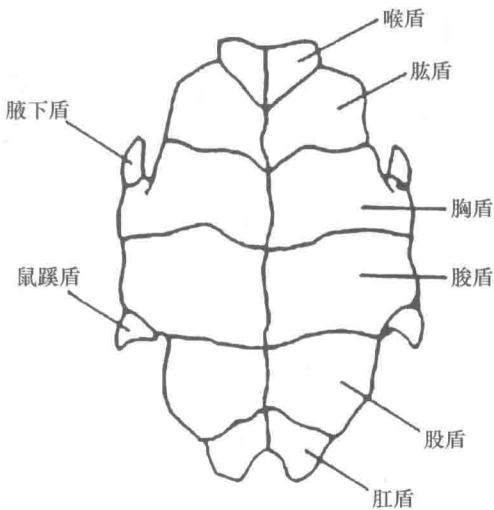
如文首所言，八角星纹有八个角，但实际指示的只有四方。龟之腹甲亦然，从龟腹甲的盾片或骨板上可以看出，龟腹甲也有八个角，分别是喉盾两片所在两角、甲桥处四角，以及肛盾两片所在两角（图四）。虽然龟腹甲上存在八角，但与八角星纹一样，这八个角实际指示的只有四个方向。所谓“八方”，是在“四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淮南子·原道训》谓：“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

从龟腹甲上还可以看出，喉盾与肱盾之间有条沟，此沟称为“喉盾沟”；股盾与肛盾之间也有条沟，被称为“股肛沟”^②。喉盾沟与股肛沟各左右两条，呈相对之势，与八角星纹上的完全一致。这样，八角星纹实际上可以被看做是将龟的喉盾沟与股肛沟之间相连接的区域以相交的方式叠合而成的，这也正是二绳相交形成四方。

在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件龟腹甲上，上、下部有“×”形绳索磨痕，而在腹甲的下端，一侧被磨去一段，但仍可清晰看出一道股肛沟（图五，1）。将“×”形与股肛沟联系起来看，正是中间带“×”形的八角星纹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如崧泽文化上海青浦出土的那件。同是大墩子出土的一件腹甲上则有更清晰的绳索磨痕，其位置恰好也在股肛

后的腹甲图案，无“×”的是未捆扎的（图三）^①。从中可以看出，八角星纹与龟的腹甲有关。王育成在论证之末还援引了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吏俑铠甲上的八角星纹，从象征的角度指出，将八角星纹绘于铠甲之上，取龟甲坚固、龟灵长寿以佑护甲士之意。

笔者赞成王育成将八角星纹与龟联系起来观点，在此基础上，拟作补充论证。王育成已经注意到了史前龟甲上的捆缚痕迹与八角星纹中的“×”图案相似。实际上，即



图四 龟腹甲盾片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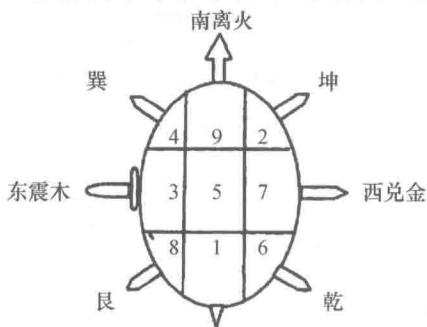
① 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② 王培潮主编：《中国的龟鳖》，第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沟处，磨出了八角星纹的一角（图五，2）^①。由此可见，八角星纹与龟腹甲在形的层面确有相似之处。至于象征方面，两者无疑都体现了宇宙观中“四方—中心”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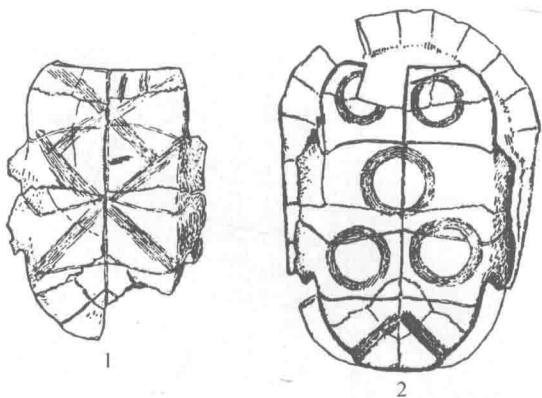
再来看冯时的观点。冯时的核心论点是，他以八角象征八方，而将两个菱形交午处所形成的正方形视为中宫，这正好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九宫图案。九宫图即洛书。提到洛书，自然会想到“元龟衔符”一类传说，而事实上含山玉版出土时恰夹放在玉龟的

背、腹甲之间。冯时指出，洛书图像与玉龟伴出，使我们相信古人关于洛书为龟书的种种议论并不是毫无根据。冯时在论述九宫的过程中，曾经借鉴了藏族流传下来的九宫图来辅助他的论证。但是，他并未提及藏族的九宫图与龟的关联。据西藏的传统说法，在古代英雄以及吐蕃，九宫一般被叫做“sme-ba-dgu”，意为“九甲块”，据称其来自宇宙的金龟，它除了有指定四面八方的意思外，还蕴含着把握时间的规范、了解宇宙的结构等意指^②。在藏族神话中，宇宙开创之际，还没有天地八方，仅有世间大金龟，于是天神降伯阳（文殊菩萨）等用九刃剑插于背部而出现9个洞（即九宫之格），由此出现9种颜色和9个数字，还有与之相对应的各种神灵（列有各神详细的名称和体貌特征）。天神又于其肋部插入智慧之刀，刀把在东，刀尖朝西，由此大金龟头向南而流血成火，尾向北而流尿成水，四爪抓地而成天地四种元素（民间说法为四爪抓泥成山），木质刀把向东成木，刀尖向西成金，这样头尾四肢再加上这把智能之刀就构成宇宙的八个方向与宇宙的八卦（图六）^③。



图六 藏族神话中的宇宙生成图
（据孙林，2007年）

有学者指出，这一神话与内地古老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有极深渊源，在春秋战国以后流行的龟占应是其神话的直接参考模式^④。的确，藏族神话宇宙开创中那九刃剑插于背部形成9个洞这一细节让人不免想到新石器时代东方沿海地带考古学文化中对龟甲的钻孔。



图五 大墩子遗址出土有磨痕的龟腹甲

1. M44: 26 2. M44: 13

①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② 孙林：《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

③ 孙林等：《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观散议》，《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④ 孙林：《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



图七 西藏民间占卜盘

在西藏民间还流行一种九宫占卜盘(图七),它再现了金龟生成宇宙的神话。如图所见,这一九宫图以龟为背景,充分显示了九宫与龟的密切关系。

无独有偶,比藏族的九宫图年代要早,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群6号墓中出土有“博局占”木牍,此木牍正面画一龟,左下足下面注字曰“以此右行”,上部的9行文字为龟占的解说,文句中明确注出此龟尾向正北,头朝正南,“左肋”东、“右肋”西,四足分别指向四维,其下方的六十甲子呈20个角的“复杂亚形”,类似龟甲形状,背面为博局占盘(图八)^①。无疑这个式盘也与九宫占有密切关联。

既然九宫图与龟有如此渊源,而冯时又发现了八角星纹与九宫之间的秘密,那么八角

星纹与龟的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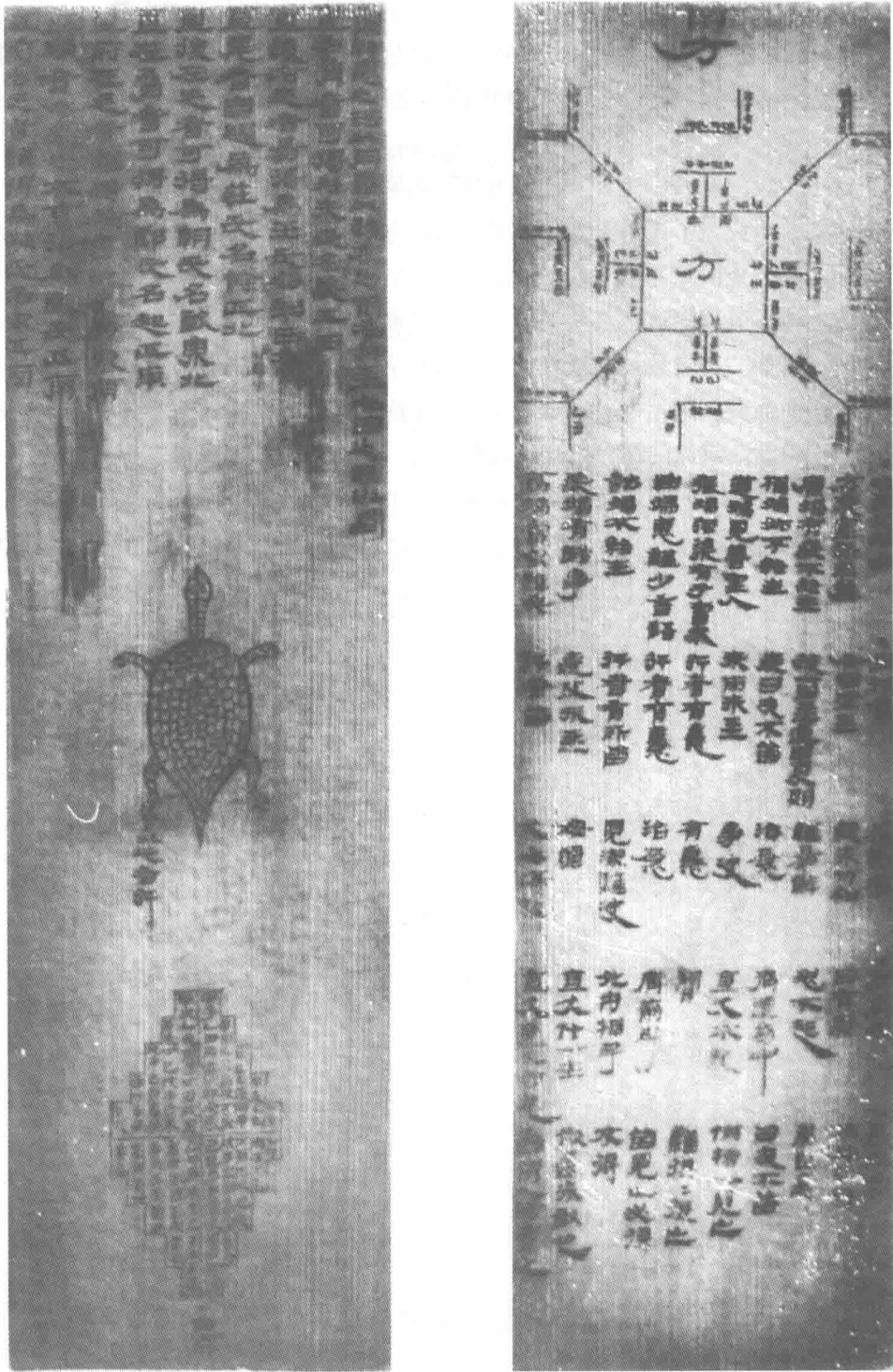
李学勤是将八角星纹解读成“巫”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巫字作“𠩺”。其实“𠩺”与八角星纹,包括商周时期盛行的“卍”形,在形态上是十分相似的,均可看作一个“十”字,反映了四方的观念^②。美国学者艾兰曾经指出,“卍”是“地为方”这种信仰的来源,在形状上极像龟之腹甲^③。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出,八角星纹或许正是“卍”形的前身,八角星纹盛行于新石器时代,到了商周时期只有零星发现,取而代之的是,“卍”形开始大量出现,并且作为“卍”形出现的一个重要场合,即铜器的圈足位置,也与八角星纹多出现于陶器的腹部位置相似。同时,如果八角星纹是“巫”字,那么它与龟的密切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龟是用于占卜决疑的重要道具。在凌家滩07M23出土一件玉龟和两件玉龟状扁圆形器,器身上皆有钻孔,器内搁置有玉签,玉签为扁圆形圭状,顶端圆弧,底端略呈三角形,并有一对钻圆孔^④。凌家滩玉龟腹腔内装玉签这一现象,与其他文化龟甲内装骨针或骨锥的现象相似。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大墩子M44出土两副穿孔

① 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

② [英]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第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③ [英]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第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④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图八 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博局占”木牍所见龟与博局占之关系

(据《文物》1996年第8期)

龟甲，一副发现在人架左腹上，内装骨锥6件；另一副发现在人架的右腹上，内装骨针6件^①。大墩子第二次发掘的情况，也提到龟甲内装有骨针，“有的龟甲内装小石子四颗或六颗，有的内装骨针六枚”^②。王因 M2301 出土龟甲内装有11件骨锥，M2151 出土龟甲内装有7件骨锥等^③。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学界一般认为是早期的龟卜方法^④。进入商周时期，龟卜大盛，商人逢事必卜，龟成为了人与天、与神灵、与四方交流的媒介，而主事之人正是通晓天文术数，沟通人神天地的“巫”。巫与龟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知道，八角星纹“龟甲绳缚”说、“九宫”说、“巫”字说从不同的视角分析，真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是，在对这些看似相异的观点比较过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八角星纹的文化内涵是存在多个层次的，而它的原型，或者说作为文化内涵基质的部分，应该与龟有关。龟与八角星纹，既在形的层面上非常相似，在象征性方面，它们又均为早期宇宙观“四方—中心”观念的符号。同时，将八角星纹的原型归于龟这一观点与新石器时代东方沿海地区的龟灵崇拜这一宏观文化背景也是可以相互呼应的。

①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81、191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④ 参见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王育成：《含山玉龟片补考》，《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